

LUN XINSHIQI
ZHONGGUO DE
ZHISHIFENZI
WENTI

论新时期
中国的知识分子
问题

林樟杰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九五”社科基金课题

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主 编

林樟杰

副主编

毛小英 黄中元 章佩敏

撰稿人

林樟杰 毛小英 黄中元 章佩敏

封金章 郑黎芳 范晓萍 陈 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林樟杰主编.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ISBN 7-313-02168-2

I. 论… II. 林… III. 知识分子-中国-文集 IV. C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142 号

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林樟杰 编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281208 传真 6468379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6 875 字数:175 千字

版次:1999 年 4 月 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8 月 第 2 次

ISBN 7-313-02168-2/C·040

定价:18.00 元

本书任何部分文字及图片,如未获得本社书面同意,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本社更换。)

序

王生洪

实践证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邓小平同志一直关心和思考的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华人科学家时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和迫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和解答这个“特殊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寻求正确的解答,大家深入调研,积极探讨,撰写了许多见解新颖独特的著作。由林樟杰同志主持撰写的《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一书,就是许多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著作中有新意的一部。

这部书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立足当今,放眼世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详尽研究分析,凡是涉及到知识分子的问题,无所不谈,有经验,也有教训,有主观局限,也有客观失误,读罢让人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坚持横向比较与纵向剖析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有对历史运动轨迹的回顾和反思,又

有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与建议,也有对 21 世纪的展望,使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所以“特殊”,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也不能脱离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作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是仅仅罗列现象,停留在对材料的一般分析与介绍上,而是在对大量调研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大胆提出一些富有新意的见解和对策。比如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问题,作者通过对知识分子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深入调查研究,认为知识价值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完全体现,对知识分子整体评价仍然是社会声望高、经济收入低,提出了要提高知识分子整体经济地位,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长治久安所必需的观点。又比如关于做好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作者围绕党与知识分子合作共事关系,运用正反事例说明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关键有两条:一是制定正确的政策,二是要有一支善解人意、把握知识分子特点的干部队伍。作者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实施倾斜政策和创造学术民主氛围的意见。再比如关于知识分子与“科教兴国”的关系问题,作者纵横古今中外,站在 21 世纪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强调实现“科教兴国”要有人才,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等于人才,主张大力培养人才、开发人才、交流人才、凝聚人才,提出了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跨世纪工程来抓的系

列对策思考。总之,作者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创新建议和对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纵观全书,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全面论述我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学术著作。全书材料新,观点新,思路新,内容丰富。它的出版,既对党政有关部门研制知识分子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对大家学习邓小平理论起到一定的辅导作用,这将进一步推动全党全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在此,真诚感谢作者两年多来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21世纪已经走近我们,全世界正快步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海内外两院院士时指出:“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我相信,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演变,而且必定为知识分子大有作为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1998年8月5日

目 录

总 论 新时期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1
------------------------------	---

第一部分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及其对

实践的指导	19
一、和平与发展的呼唤——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论述的时代背景	19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论述的核心内容	24
三、科教兴国——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论述指导下 的实践	36

第二部分 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43 |

一、调查的目的、方法和对象	43
二、现状与分析	45
三、几点启示	75

第三部分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回顾与考察 83 |

一、从依附到独立：历史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83
二、依靠力量还是异己力量？	91

第四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问题若干

认识上的误区	112
一、知识分子范畴的界定	112
二、对知识贬值及“脑体倒挂”的历史反思	118

三、误区种种	134
第五部分 时代需要高素质的知识分子	150
一、知识分子的内部矛盾	150
二、知识分子的外部关系	154
三、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发达的 基石	162
第六部分 面向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对策与思考	168
一、一个基础:营造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	169
二、一个关键:增强从政治到学术的民主空气	179
三、一个政策:实行灵活、宽松、自主的知识人才流动 政策	182
四、一个机制:形成新的工资增长、职称评定、住房分配 机制	193
五、一个方法:贴近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实际,有区别地做 好知识分子工作	200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09

总论

新时期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

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敏感,分量很重。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无比灿烂辉煌和永远值得骄傲的篇章,并由此积淀而成世界东方文化的底蕴。但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伟人秦始皇嬴政,以其焚书坑儒的刀光火影,一举将知识分子及其智慧的结晶,统统打入了万丈深渊。知识分子的这种一起一落、大起大落,一荣一辱、大荣大辱的境遇,从此连绵不断,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余年。

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崭新的姿态,组建起自己的出色的知识分子队伍,并由此唤醒亿万民众,带来了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胜利。但是恰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发生了“左”的严重偏差,导致了难以估量的不幸后果。有鉴于此,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八年以后的 1984 年,即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改革开放大步迈进的时候,在会见华人科学家时,以深沉而又坚定的语调,讲了这样一段扣人心弦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1]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特殊问题,它敏感、分量很重。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到 80 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解决

好。这个问题迫切、重要,而且非常迫切、非常重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二

要解决这个特殊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个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是一个高智能的群体。它以科技之伟力与人文的精神塑造社会,一头通向过去,通向传统;一头通向未来,通向新时代。

在以阶级观点为唯一标准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永远被戴上阶级的帽子。再加上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于是知识分子仅仅作为了某个阶级服务的工具而存在。这种理解显然是狭隘的。

在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知识分子一个整体,发挥着领导历史新潮流的作用。资本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内部;社会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内部。正如本世纪初列宁所说的:“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长成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例外。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只能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些知识分子。而引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也只能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在外力的强制下,而是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中国胜利地带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最杰出

的代表,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带头人,80年代中期在引导中国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再一次提醒全党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

在“越来越取决于”这几个字后面,我们可以感觉到问题的紧迫性。

国力,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三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因此,对知识分子特点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对脑力劳动的特点的认识出发。

脑力劳动有三个基本的特点:

(1) 它以个体性为基础,因为一个人的思维决计代替不了另一个人的思维,包括其内容、方式、路径。

(2) 它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超常的价值,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超常的反价值;可以非凡地活跃,也可以空前地愚昧、麻木。

(3) 它更多的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机械的简单的重复。

从脑力劳动的上述基本特征出发,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许多个性、特点、习惯,往往是从这里产生的、形成的。比如,他们崇尚独立思考,而不愿轻易服从。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民主意识,而对强加的压力有着本能的憎恶。

从脑力劳动的上述基本特征出发,我们同样应该注意的是,不

能用管理体力劳动的办法去要求知识分子。而这一点曾经被严重地忽略了。比如,个体性、独立性强,往往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不良思想划等号,从而产生对知识分子人格评判上的扭曲。又如,用计件工资式的机械办法来计算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工作量,恰恰是把伸缩性很强的、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复杂劳动简单化了,从而产生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估价上的失衡。

从脑力劳动的上述基本特征出发,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对待知识分子,你若了解他、尊重他、信任他,他会以极大的能动作用,创造出人间奇迹,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道理。你若不了解他、不尊重他、不信任他,那就是意味着在磨灭他的能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你若压制他、打击他、迫害他,他将迟早会爆发出另一种对抗的能量,这种能量是可以惊天动地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有着丰富的内涵,但其核心内容,我认为还是八个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同志再三要求我们各级干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三要求在党内,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他还提出要把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并明确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战略方针问题提出来。^[4]

邓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谆谆教导,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为我们党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奠定了认识的和实践的基础。

四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高风亮节的优良传统,也有沉重可叹的历史包袱。

知识分子历来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真诚的历史责任心、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范仲淹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十分生动、形象、贴切地描绘出古代知识分子那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心态。而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知识分子高尚情操的写照。

知识分子历来重视人格尊严。士“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5]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格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他们重操守、重名节、重信念的品格的真实流露。

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包袱也特别沉重，这与中国封建时代特别长久、封建制度特别坚固有关，尤其跟中国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同外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一个重大的包袱。外国知识分子也参与政治、干预政治，但他们更多地独立从事学术和研究活动。政治与学术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或鸿沟。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出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却把“从学”与“从政”完完全全捆绑在一起了。一个知识分子从乡试到会试到殿试，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一级一级爬上去，读书与做官并轨，学术与政治合一。知识分子的前途就是仕途。历史的包袱从中而来，知识分子的悲剧从中而来。

这种因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而形成的深沉的积淀，并不会随封建时代的结束而消融。毕竟从宣统末年到新中国成立才只有38年，比起几千年的历史来，太短暂了；比起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来，太浅薄了。必须卸下这个历史的沉重包袱。

五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包袱并不能靠远离政治来解脱。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脱离政治，也不应该脱离政治。作为中共党员的知识分子更不可能，更不应该。作为党员干部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不该脱离政治，而且必须讲政治。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担负着

历史的重任。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现在已经找到了,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所指引的道路。

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且被党的十五大确认为伟大旗帜的邓小平理论,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并且有更深体验的人文精神,就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而这就是政治。这种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研究问题,不仅不会起思想禁锢和束缚的作用,相反会起一种科学导向和拓展、深化的作用。

从政治本身在当代中国的含义来讲,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全体人民向往的事业,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们的党、政和一切权力部门,要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环境;这是一种能让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充分施展才华的环境,能放手、放心大干一番事业的环境。而这种新政治环境的前提是:

(1) 让知识分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和“臭老九”的阴影下永远摆脱出来;

(2) 让知识分子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和姓“社”姓“资”的争辩旋涡中永远摆脱出来;

(3) 让知识分子从对意识形态的杯弓蛇影的惊恐不安中永远解脱出来;

(4) 让知识分子从长期存在着的轻视教育、科技、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观念下永远解脱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战战兢兢,不再临深履薄。这就是真正“宽松”的政治环境。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

有了这种环境、这种局面,知识分子的历史包袱可以说真正放下来了。

六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有历史包袱之外,还有现实的种种包袱。比如他们有时会一反常态,变得过于轻信和迷信。尤其是在特定的时候,轻信甚至迷信权威、洋人、古人。他们曾经轻信和迷信过“苏联老大哥”及其闪亮的集体农庄,也曾经轻信和迷信过“美国之音”及诱人的西方民主。所有这些轻信和迷信,结果都吃了苦头。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实践、比较、思索,变得越来越远离盲目性,变得越来越成熟和具有真正的独立性。这同我们的党所经历的道路是完全一样的。

当1982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上某些人说了一个响亮的“不”时,人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这是中国的力量。他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7]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像我们的祖国一样,以豪迈的姿态站在新世纪的门坎前。

请听:这是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吴孟超教授的话:“我是中国人,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是他,第一次打破“肝脏禁区”,成功地从病人肝脏上切除了癌瘤;是他,顺利地施行了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又一次突破被称为肝脏“禁区中的禁区”;也是他,征战40年,率领中国肝胆外科事业不停顿地向前腾飞,使之始终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吴孟超的一位学生为祝贺老师72岁生日,留心统计了吴孟超72岁这一年所做的工作:接诊、会诊中外患者181人次,亲自操刀行肝脏手术61人次,国内外出差25次、行程十几万公里,主编93万字的《腹部外科学》出版发行,指导21名研究生,担任60多个学术和社会职务……当人们劝他保重身体时,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前起不来,这一辈子也就问心无愧了”。

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

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怀。

七

我们在讨论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应该是：知识分子与市场、与商品的关系问题。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的出发点。

怎样看待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价值？

答案始终是清楚的——马克思早就明确地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8]

但最初的不平衡出现了：“造导弹原子弹比不上卖茶叶蛋”。

在某大学校园里，数学教授摆起了小杂货摊。

新矛盾：“脑体倒挂”！

当人们忿忿不平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种现象并没有一直延伸下去，情况起了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科技作用的日渐明显，知识分子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活力，它的生命，它的后劲。

人们不再笼统地讲“知识分子待遇低”，而开始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承认知识的价值。不惜代价找高质量的学校就学，不惜工本招聘高学历的人才，注重学习社会需要的知识，成人教育方兴未艾，读书收费理所当然……

其次，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知识分子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大有余地的，是大有作为的；卖茶叶蛋、摆小摊不可取，搞高科技、为社会提供服务可行；知识分子应该振奋精神，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新的历史条件为知识分子发挥专长、实现抱负开创了一

个全新的广阔的天地。

第三,看到知识的价值还不到位。但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同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不完善有关,与国家综合实力不强有关。推进祖国社会主义的整个事业的发展,是解决知识价值到位问题的根本。

第四,更意识到,只有最终实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部价值,才真正谈得上“科教兴国”,才真正谈得上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谈得上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辉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人物,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八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商业的兴盛,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商人之间的界线,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界线,不断地趋向淡化。管仲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在 21 世纪将变得更为模糊。但哪怕是在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种淡化和模糊目前都还没有达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这样一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种分工的界线仍然明显地存在。

只要这种状况、这种国情尚未改变,“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命题,就仍然具有真理性。所不同的是其内涵存在着差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这个命题意味着: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有可能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局面,凝聚工农成为革命主力军,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实践证明,这个命题动员了知识分子,唤醒了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终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迎来了革命的胜利。